

傅莹——她从草原来

廖楠

看了傅莹作为人大发言人的首次亮相，她的丈夫郝时远觉得“挺好”：“两会期间我们分别住在各自住地，见不了面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只发了两条短信给她，表示祝贺，也鼓励她继续努力。”郝时远是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。近日，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，讲述了妻子的点滴生活。

当“忙”成为常态

大约是在两会召开前10余天，傅莹告诉郝时远，自己将出任全国人大发言人，直言自己压力不小。郝时远也认为，从外交官转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发言人，对她是个不小的考验。

那段时间，傅莹比以前更忙，连着好几天都是夜里11点多才到家。他心疼妻子，却又对她的这种状态习以为常。在傅莹担任驻外大使的10多年里，夫妻二人只能借着休探亲假的机会团聚，2007年傅莹出任驻英国大使时，郝时远曾陪她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国书。2010年傅莹回国后，两人还是聚少离多。“每周5个工作日，她能有一天回家吃晚饭就不错，一般在8点后，周末也至少有一天要加班。有时回来得稍微早点儿，她就会念叨，‘哟，我今天走得比部里其他领导还早’。今年春节，她也是大年初四就开始加班了，忙（外交）部里的事。做她这个工作，肯定是这种状态，这一点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也理解。”

因为忙，傅莹很难有时间陪伴家人，于是，郝时远左肩挑着科研重担，右肩也不得闲，回到家“要操持家务、带孩子”。他笑言，因为厨艺不错，自己成了家里的主厨，平日里会做些家常便饭，“有时也会做一些内蒙古的

家乡菜”。“当然，她（傅莹）的西餐也做得很好。我们这代人都插过队，从小就帮着操持家事，都会做饭，关键是在没有时间。”

郝时远回忆说，多年前，他们还年轻，工作还不是特别忙。每到周末，他们总会去打网球、带孩子玩。但现在两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运动的时间。

好不容易有一天能休息，夫妻俩一定会睡个大懒觉。“我们家这位，最缺的就是睡眠，毕竟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，我很担心她的身体。”每当这个时候，郝时远总不太愿意和妻子谈工作，特别是“外交大事”，两人只想平静地待一会儿，聊一些平常人家都会说的琐事，或者看看电视。傅莹有时也会忙一些家务，比如清理衣服、打扫房间。“我们其实就是普通人、普通家庭，生活内容什么的，和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。”

夫妻互当“参谋”

除了生活上相濡以沫，工作上遇到问题时，夫妻俩也常给对方当“参谋”。

一直以来，傅莹总喜欢根据不同的场合，以简约的素色长围巾搭配各种彩色西服外套亮相。她的穿着总会让人眼前一亮，更有人称她为“时尚外交官”。

虽然在着装方面已经有很多心得，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但此次发布会前，傅莹还是拿着几套比较正式的服装，让郝时远帮忙看看穿哪套亮相更合适。“我们一起讨论了许多细节。比如，背景板可能是什么颜色？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，背景板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红色块，背景板之外的墙壁又是灰白色，这些色差都需要

考虑进来。”最终，他们选定了一件宝蓝色西服外套。

郝时远在此次政协会议上提交的“关于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”的提案，也事先和傅莹在家里讨论了一番。“去年，我参观完南京大屠杀博物馆，心情沉重极了，同行的人也都流下了热泪。我当时就开始思考，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国，我们建起了几百处抗日的纪念设施，几乎每个省都有，但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纪念英烈而立，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‘勿忘国耻’的悲情之上的，这也容易导致一种‘现代抗日’的心态，缺乏一种战胜国‘振我国威’的豪情，以及豁达的大国胸怀。傅莹曾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，现在也负责亚洲事务，一直比较关注中日外交关系。回到家后，我跟她讨论起这个问题，她也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碑，要实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这很有必要。”

“一直努力，这才有了今天的她”

傅莹和郝时远都是蒙古族人，自大学时代相识至今，夫妻俩已携手走过数十年，让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已嫁为人妇。记者想从郝时远口中问出更多二人间的往事，他“吝啬”地说，那么多件，没法挑出哪一件来仔细说，但有一点，妻子，她的性格确实一直没怎么变：“大家都说她温婉，我看也是。还有努力，这是她最大的特点，从小就是这样。”

1953年1月，傅莹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傅莹总忘不了内蒙古，她喜欢喝自己熬的奶茶，喜欢听内蒙古的长调，喜欢选择蒙古族歌曲CD当作外交礼物。内蒙古这片广袤的草原赋予了她开朗、热情的性格，也让她变得坚韧。

傅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，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。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，傅莹从小就热爱阅读。

（转右边）

被邮局拒绝之后

何慧慧

1921年，德威特·华莱士接到纽约邮局苏珊的电话，通知他去一趟。华莱士之前了解到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大增，便产生办文摘类刊物的想法。于是，他办理了刊物执照，可到邮局办发行手续时，却被告知邮局对此类刊物的发行政策尚不明确，得先请示上级。两个月后，邮局终于有了答复，华莱士赶去听结果。

（接左边）“你刚才问到我们共同的兴趣，那可能就是阅读吧。一有时间，我们都愿意坐下来读书；有新的书、新的讯息，她都想学习。”郝时远说，知识的不断累积，让傅莹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更养成了思考总结的好习惯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因为父亲冤案被关押，傅莹中断了中学课程。1970年，在“上山下乡”的热潮中，她来到内蒙古西部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，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多。在广播站工作期间，她毫无文弱女孩的娇气，而是像男人一样，经常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

邮政大厅坐了30多个人，原来他们都有办同类刊物的计划，只是因邮局征订发行受阻，一直没实施。苏珊严肃地说：“邮局暂时不能征订发法。于是，他办理了刊物执照，可到明年秋天后。”众人纷纷抱怨邮局无视客户利益，办事过于死板。华莱士却突然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了。

随后，华莱士和妻子用小型印刷

奔走于兵团的各个站点，爬电线杆、架银幕，为战友们放映影片。日后，每每回忆这段经历，傅莹总说让自己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身体的各种极限——饥饿、寒冷、体力透支、精神磨炼：“这些体会，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，让我能够吃苦、更加坚强，也让我变得更豁达，做事情不那么斤斤计较，乐于也敢于奉献。”

工作的艰苦却并没能磨掉傅莹对学习的渴望与斗志。那几年，她硬是靠自学，学完了高中各科目的知识。1973年，她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。

倾一生 做一事

谢国渊

有这样一位画家，一生只画花卉，尤其钟爱玫瑰。任凭世事风雨，他都潜心绘画，沉迷其中。几十年来，他孜孜以求、不断探索，把科学的严谨与艺术的美感融入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之中，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。他的作品清新典雅、明快生动、色泽自然，让人叹为观止。由于他的执着与专注，他先后记录了169种玫瑰的姿容叶貌，绘成了举世闻名的《玫瑰图谱》。这本被称作“玫瑰圣经”的图谱，在他之后的180年里，以各种语言出版了200多个版本，其艺术高度至今无人能破。他就是被称为“花卉中的拉斐尔”的法国画家雷杜德。

有这样一位商人，当兵退役后在路边开了一家小加油站。为了招揽生意，他把炸鸡卖给过往的司机。由于炸鸡味道好，生意十分红火，于是他扩大规模，在加油站对面开了一家炸鸡店。他一边经营，一边钻研，配制出有40多种药草和香料组成的独特秘方。使用这种秘方的炸鸡，表皮

油光红润、通透香脆，而鸡肉则鲜嫩爽滑、肥而不腻，达到了令人吮指的口味，深受顾客青睐。

不久，他的加油站和炸鸡店因建高速公路而被拆除。无奈，他只好带着炸鸡秘方四处兜售。整整两年，他被拒绝了1009次，终于在1010次时，有一家饭店答应购买他的配方，加盟到他的名下。这便是世界上餐饮加盟特许经营的开始。之后，在他的坚持下，先后有400家饭店加盟，他的生意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。今天，他的加盟店遍及世界各地。他就是肯德基的创始人——哈兰·桑德斯。

有这样一位通信工程专家，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电话电报公司，从事通信传输材料的研究。早在1966年，他就果断提出，利用玻璃清澈、透明的性质，使用光来传输信号。与传统铜线传输的方式相比，它传输的信息量更多、速度更快。而当时，人们都认为他的想法匪夷所思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在电影圈放把“金扫帚”

田亮

程青松的人生信条是：“不走寻常路。”这句话，他是从头开始落实的：把左右两侧的头发包剃1/3，只留中间，还把剩下的头发扎起来——与其说是马尾辫，不如说是“扫帚”，一排短发条缕分明地立在那，让程青松极为自豪。让他更自豪的还有一把“扫帚”——2010年，这位电影杂志主编仿效美国金酸莓奖创办了中国电影金扫帚奖，每年评选一次最令人失望的电影、导演和演员。

前3年，从未有人来领奖。而今年却出乎了所有人意料。3月3日，第四届金扫帚奖颁奖礼上，当主持人宣读最令人失望导演由《王的盛宴》导演陆川和《河东狮吼2》导演马伟豪共享后，一如既往地随口问道：有人来领奖吗？一个女孩从角落里站起来，替马伟豪领奖。随后，《疯狂的蠢贼》制片人李明阳亲自现身，领取最令人失望的中小成本影片奖，并念了3分钟的检讨书。美国金酸莓奖从创办到有人去现场领奖，走了十来年，金扫帚奖4年，“比我预期的时间早了很多”。

程青松的工作室位于北京电影学院西侧的一个居民区内，既是办公场所，也是他的居住地。书柜上放着3把“扫帚”，一个和书差不多大小，另外两个手掌那么大。“大的是去年的奖品，两个小的是今年的。”程青松说着，又摸出一兜小扫帚：“我们准备了很多，但只发出两把，剩下的都用来打扫屋子。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！”

“金扫帚这个名字怎么来的？”记者问道。程青松说：“它有3层意义：第一，中国有句成语，敝帚自珍，我希望电影人珍惜自己的作品；第二，用扫

帚能扫尘除垢；第三，扫帚在故事里是有魔力的，我希望得奖者日后可以乘着金扫帚飞翔。”

从放映员到专业影评人

刚出生时，程青松的名字是程闯，父母都是重庆的老师。快要上小学时，父母带他去看京剧《沙家浜》，程闯被其中的唱词“俺18个伤病员，要成为18棵青松”打动，自己改名为程青松。

后来，父亲调到电影院工作，程青松跟着他看了不少电影。小学时，在课本里读到地主把毒药倒进村口的井里，加害村民，他就问外婆，地主长什么样？外婆却说，她们村的地主对人还蛮好。“从那之后，我意识到，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，不要随随便便相信。”

中学时，程青松的语文成绩很优秀，但不喜欢数学。1986年高中毕业，由于偏科，他没考上大学，只得在家乡重庆云阳县的电影院当了一名放映员，工作内容是卖电影票、放电影、在电影院内巡逻，一干就是9年。每天他都要放映至少3部影片，9年里他看了上万场电影。“这段经历对我进行电影判断特别有用，让我明白什么样的电影会满场，什么样的只有十来个人看。”他说。

程青松对写作一直没放弃，并在1995年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、一篇中篇小说。也是在那一年，他因为文学特长，作为特招生进入向往已久的北京电影学院。就读期间，他创作出两个剧本：《莫斯科的爱情》和《生于1966》，都是对边缘人物命运的思考。

在大学里，程青松认识了姜文、贾樟柯、王小帅、娄烨等导演，经常与他

我是怎样快乐起来的

李昌钰

人的信仰不一定要局限在宗教。只要你从信仰里面找到真爱，做到身心和谐，看得开，放得下，你就会快乐。

在读博士的时候，我有份工作，薪酬是1.9万美元一年。等到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，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：恭喜你，今天开始要叫你李博士

了，但是你要把那份工作辞了。我想，糟了，刚当博士就下岗了？他说，我很喜欢你，你就留在这里做博士后。他给我6000美元一年。回家我跟我太太说：好消息，从明天起你开始叫我李博士！好消息，我们的家用从19000美元变成6000美元了……

后来，我当上教授，一年的薪水有

们一起谈电影、聊创作。后来，程青松成为专业影评人。从2002年至2008年，他一直担任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总撰稿，2009年则成为金鸡奖颁奖典礼总导演。其间，他担任编剧的影片《电影往事》、《沉默的远山》分别获得夏衍电影文学奖剧本三等奖、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。

谈金扫帚：观众对烂片的看法惊人的一致

程青松很怀念当放映员的日子。“那是影评的黄金时代，也是中国思想界很激荡、澎湃的时候，像批评家朱大可就敢在谢晋导演最辉煌的时候，发表《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》。可近10多年来，整个氛围就不正常了：资本可以买断影评；制片人给影评人红包；影评人成了制片商的代言人……影评人应该是文化的看守者和督促者，而不是纵容者。”

程青松不愿“被收买”，他也不怕得罪人，接受采访时，“烂片”、“演得假”这种词随时挂在嘴边。“2009年，中国电影票房特别高，超过60亿元，但是电影口碑却很不好。”程青松说。为提升中国电影质量，2009年11月的一天，刚创办中国影评网《青年电影手册》的他，又提出创办中国最令人失望电影奖——“金扫帚奖”这个概念，并在第二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金扫帚奖颁奖礼。

金扫帚奖由两轮投票产生，第一轮完全交给影迷，再由数十位资深影评人、专家、学者等选出最终获奖者。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话说：“金扫帚奖是与观众平行的一个奖，不受雇佣，不媚权势，不论亲疏。从电影文本出发，以专业的立场、独立的身份，以电影批判影响电影创造，是鞭策中国电影的一个奖。”第一届时，只有1万影迷投票。到第四届，已经有200万影迷参与。

摘自《青年博览》

3万美元。但是1976年，我被要求担任第一任鉴定中心主任。做鉴定中心主任，1万美元。回家我又告诉太太：好消息，明天你可以叫我主任了！坏消息，我们的家用又回到1万美一年了。

很多人说我傻，好好的终身教授不做，做这个主任干什么。但我觉得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我妈妈对我的教育就是，人家不做你要去做，这样可以为下一代中心打开一个局面。后来我们鉴定中心成了世界上最红的刑事鉴定机构。

摘自《意味》

名流故事

数学家家的辩护状

张达明

德米特里·克里欧科夫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数学高级研究员，不久前的一天上午，他驾车行驶到一个路口时，恰逢红灯亮起。正当他准备刹车时，不料鼻子突然发痒，接着便响亮地打了个喷嚏。他紧急刹车，车险差点越过停车线。就在他为没有闯红灯而庆幸时，距他30米开外的第一名执勤交警还是飞快地跑到他跟前，不由分说就开了一张400美元的罚单。

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，克里欧科夫可是以爱较真出了名的，对于从天而降的400美元罚款，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。于是亮出了自己的撒手锏，连夜洋洋洒洒撰写了长达4页的辩护状，几天后气宇轩昂地走上法庭进行申诉，以证明自己的“清白”，要求进行无条件撤销对他的“错误罚款”。

法庭上，克里欧科夫“义正词严”

地指出：“给我开罚单的那名交警，是在停车标志30米之外看走了眼而错误地闯了红灯。而事实是，我根本就没有闯红灯。我认为，是3个巧合让那个警察误认为我闯了红灯。1.观察者目测的不是汽车沿道路行驶的直线速度，而是汽车行驶时相对警察所在那一点的角速度。这就像我们站在路边观察匀速前进的汽车一样，当车离你很远时，它看上去速度很慢；当它离你很近时，人们却误以为它开得快。2.汽车减速，随后又加速。3.短时间内，观察者的视线被外部对象阻碍。例如两辆汽车同时靠近停车线，其中一辆挡住了观察者的视线。而正是上述3个条件，才使那个交警因角度问题目测到的是角速度而非线速度，也就是说，站在垂直于汽车前行轨迹上一定距离的那个交警，才因此产生了‘汽车并未停下’的错觉。也正是那名警察对现实的

感知能力没有正确地反映现实，才导致了我被无辜地罚款，所以罚款必须予以无条件撤销。”

同时，克里欧科夫还向法院展示了大量的图形和方程式，作为自己无罪的有力论据。

近3个小时的论证，主审法官被克里欧科夫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绕晕了，多次要求停下来，让他解释他那一大套理论，但克里欧科夫却坚持要陈述出自己的观点。最终，法官以克里欧科夫“有理有据的清晰陈述”为由，当庭撤销了对他的罚单。

在赢得上诉后，克里欧科夫又将那篇为辩护写的论文发表在一家科技杂志上，不仅获得了强烈反响，而且还被该杂志评为特殊奖，奖金为400美元，与当时的错误罚款打了个平手。

克里欧科夫谦虚地对媒体说：“我之所以能赢得这场官司，应该归功于那篇有理有据的论文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从论文中找出论据的不足，以便我能继续深入完善，使之成为公众今后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一种新方式。”

摘自《风流一代》

就恢复了生机，又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。可是，“波尔多液”有毒，人一旦误食这种葡萄酒就会中毒，严重的还会有生命危险。

查尔斯不敢大意，赶紧在小镇街上和葡萄酒周围贴了许多告示，提醒人们不要采食葡萄。从盛夏到深秋，葡萄酒园居然破天荒地没有丢失一串葡萄，这在以前查尔斯想都不敢想。这也让富兰克林陷入沉思，高墙、狼狗、大棒、罚款、坐牢都防不住窃贼，而区区几桶药水居然就能解决问题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带着疑问，富兰克林结束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，也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。

许多年后，历经人生历练的富兰克林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，终于领悟到，查尔斯的办法再怎么严厉，惩戒的窃贼只是少数人，但只要有1%的侥幸心理，就会让窃贼不惜冒险一试；而“波尔多液”会让风险骤升至100%，没有哪个窃贼能够逃过，这一点对所有窃贼都是公平、公正的。同样道理，法律的尊严并不是靠严刑酷法压制出来的，也是要靠公平、公正来实现的。富兰克林后来在参加起草《独立宣言》和美国宪法时，将公平、公正作为信条融入美国治国精神，一直流传至今。

摘自《中国青年》